

《與談》

以知識及歷史重建新局

◎陳忠信

承主辦單位邀請擔任陳小紅教授〈大陸崛起下，兩岸經濟、文化與政治的衝擊——認同問題與社會問題〉一文（以下簡稱〈陳文〉）的與談人，原先因論題既大與廣，才疏學淺，愧不敢應，因而婉拒。無奈，余範英董事長來電堅命，不得已硬著頭皮嘗試為之。

〈陳文〉涵蓋面既大且廣，一如題目，先從世界大形勢縱論「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大國外交」，次論「中國深化改革過程中的挑戰」，轉而鋪陳台灣從「經濟奇蹟」到「政治奇蹟」之政經發展，繼而討論近年來從「九二共識」到「兩國論」的主張；兩岸日益熱絡的經貿與民間交流；國際生態不變下的台海關係與台灣的政策回應；以及國家認同、本土化、去中國化等等議題，最後以「邁向共存共榮、互補合作的未來」作結，並以一涵括兩岸不同

時期經濟、政治、社會層面之發展的簡表，欲以「回顧過去五十年來兩岸經濟、政治與社會變遷情勢之錯位」，來「鋪陳未來應可採循之走向」。

〈陳文〉含蓋面雖然既大且廣，但文章篇幅並不多，全文八個論題，短則四百來字，長則千把字，這就注定了此文的寫法必須是「大題小作」。舉凡文章之作，「大題小作」雖可能言簡意賅之效，然若所論之題，涵攝面複雜錯綜，或具高度爭議性，則不免會有把問題簡單化或不具分析性而僅在陳述己見的危險。

先就論題而言，「大陸崛起下，兩岸經濟、文化與政治的衝擊」，究竟是要討論「大陸崛起」這一現實，各自對兩岸經濟、文化與政治的衝擊？還是「大陸崛起」這一現實對與大陸密切交流之台灣經濟、文化與政治的衝擊？而副題「認同問題與社會問題」究是大陸崛起，各自對兩岸衝擊或出現「認同問題」，或出現「社會問題」？還是因大陸的強勁崛起，對因與大陸密切交流的台灣社會產生「認同問題」與「社會問題」？從〈陳文〉的鋪陳，與談人還是抓不到論旨所在。

跳出來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迄今四分之一世紀，獲致重大成就，也大大改變了中國大陸經濟、社會、政治的面貌；經濟上，從文革後期的物質匱乏／差可溫飽階段，歷史性地跨越到十六大政治報告所宣稱的「還是低水平的小康」階段，甚至蘊

藏邁向經濟大國的潛力；社會上，從高度控制的均質化社會，發展到出現一定程度之分殊社會，而且存在著相當嚴峻之形勢（一個例子：長期為中共出謀獻策的學者、國家長期戰略研究小組成員王紹光、胡鞍綱，在二年前的一份調研報告即警告說：「當前中國社會形勢極其嚴峻，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係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世界上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政治上，從革命世代走向後革命世代，從強調生產關係、階級鬥爭到以強調生產力為主軸的「三個代表」寫入黨章，且將入憲，以及資本家入黨等等「寂靜革命」（如果有人把中共從十一大以來的各次黨大會的政治報告按時間順序讀一遍，就可感覺到其意識形態變化之大）。

前述種種都是天翻地覆之變化，亦是中國崛起之過程對大陸經濟、社會、政治各層面的巨大衝擊。這不單是學術研究的豐富課題，也是釐定國家、社會發展總體策略必須面對的功課。而中國這一天翻地覆的變化，衝擊的當然不只是中國本身，十餘年來與中國大陸日益緊密交流的台灣社會，當然也持續受到巨大的衝擊，而且這衝擊又是與台灣社會本身內部強人統治告終、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所造成的衝擊交錯並生，因而更顯其錯綜複雜。

這衝擊產生很多問題，〈陳文〉副題所揭的「認同問題」與「社會問題」，確是諸多問題中的二個重要課題，而這兩個課題所牽涉的複雜面向中，很多是存在著高度爭議性的。因此，冷靜的爬梳、分析，恐怕是我們討論這議題時首先必須進行的工作，否則恐怕就很容易流於發抒己見的「政論」，而不是尋求問題癥結的「分析」。

由於〈陳文〉所涉及的論題既大且廣，而可能限於篇幅，文中的諸多陳述恐怕發抒己見的成分多於問題分析，也看不出從中可以鋪陳出怎樣的解決方案。舉一個例子，〈陳文〉以不足四百字的篇幅陳述李登輝以來所謂「九二共識」到「兩國論」的主張，讀來的感覺是作者不認同李登輝時代的政策，問題是，這種沒有分析的陳述會不會流於自說自話？與作者持同樣看法的人固然頗有同感，但認同李登輝政策者不嗤之以鼻者幾希？更有甚者，由於簡化，有些問題就顯得失焦，如〈陳文〉說「辜汪會談」簽署了所謂「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例子；兩岸間從未簽署過所謂「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而是在辜汪會談之前的兩會有關文書驗證交涉中，為求取協議之達成，在談不攏的情況下，達成了一個刻意模糊的、各說各話的提法。這段經過，我方有人說是「一中各表」的共識，但中共自始不承認這是「一中各表」，而說是「一中不表」。這種在很低層次的文書驗證中所呈現出來的分歧，正是後來更大、更具結構性之分歧的露頭而已。如果不能就此進行分析，最

後的結果恐怕就只會流於自我立場或自我認知的表述，恐怕無法有助於分歧之解決方向的提出。

這樣的問題也顯現在〈陳文〉第六節及第七節的討論中。第六節說「現階段的中國固然仍非美國對手，唯……，在在均已挑戰著美國作為世界第一霸權的地位，尤其長征火箭升空後，兩國戰略武器之競爭更加白熱」，恐怕連中共那些頭腦比較冷靜，奉行鄧小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方針的中國戰略家都未必會認同吧！而說當前國際戰略格局「蘊育出一股新的國際均衡態勢」，恐怕也只是是一種想當然耳的看法。事實上，中共主流的戰略評估雖然認為當前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日益顯現，但也不得不承認，國際格局基本上還是一超多強的格局。

事實上，九一一之後，美阿、美伊戰爭的過程和結局，正在無聲地衝擊著後冷戰時代尚未沈澱穩定的國際秩序。美伊戰爭開打前的各種折衝，戰後美國在G8會議上的強勢作為，在在顯示美國單邊主義氣焰的上揚，全球戰略格局範圍內的國際地緣政治／地緣戰略態勢的重組，正在微妙地進行著，中共所面對的，正在變化中國國際戰略格局，恐怕比他們所估計的基本態勢來得錯綜複雜。北朝鮮的核危機之解決，正是中共所面對之正在形成的基本態勢下的一個試煉。

而第六節說「政治上似乎始終透露出『本土化』多於『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思維」，以及第七節談國家認同、本土化、土中國化的部分亦然。說政府因對全球化「難以確實有效地阻擋」，「轉而將精力投注於『國家』與『社會』的重構」，說「基此，愈擔心被邊緣化而成為附屬於巨大中國的一省，……『台灣主體意識』亦愈為強烈」，恐怕也只是作者一己的感覺，同感者同感，不同感者還是不同感。試問，「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均質而兩分的嗎？

本次研討論主題「面對公與義——建構宏觀、包容與分享的社會」，確實是高瞻遠矚的議題，而當今的台灣社會，正處於民主化轉型已初步完成但尚未成熟積澱的歷史關鍵時刻，社會活力充沛，各種亂象叢生，希望與絕望併存，而全球化、中國崛起的外在衝擊、以及植基於過去歷史扭曲之本土化需求、公民意識之形成與公民社會之鍛鍊成熟等複雜動態力量相激相盪所造成的內在衝擊，在在考驗著我們能否真正建構宏觀、包容與分享的社會。在這漫長的過渡／重建過程中，知識／歷史如果還有價值，那應該是爬梳錯綜複雜的表層現象，幫我們找到問題的癥結，找到解開糾纏著的線頭，否則，問題還是問題，立場還是立場。

以上幾點是在嚴肅而巨大之課題下，從愧不敢應到勉力為之的一點感想。